

“天方之学”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精神

——从王岱舆到马坚

丁俊

摘 要: 介绍和研究被称为“天方之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我国穆斯林长期传承的重要学术传统。从王岱舆(约1584~1670)到马坚(1906~1978)以来的数百年间,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学者,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苦苦求索,孜孜不倦,秉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与时俱进,致力于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穆斯林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在构建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推进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和融合等方面卓有建树,做出了重要贡献。梳理和总结这一传统,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学”、“阿拉伯学”学科体系、促进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天方之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术精神;王岱舆;马坚

作者简介: 丁俊,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3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7)02-0068-08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一、“天方之学”的学术历程

被称为“天方之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大文化体系之一,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历史作用,泽被三洲,影响广远,至今依然富有活力,与当代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一系列国际事务密切相关。了解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然成为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课题,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我国关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和丰厚的积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很早就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有着漫长的交往历程。我国有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对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介绍和研究被称为“天方之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中国穆斯林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我国“天方之学”的漫长历程,不但是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话交流的重要形式,而且也是伊斯兰文化植根中国,进而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

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最早记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有关信息,特别介绍了被称为“大食法”的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这一重要文献虽已散佚,但从杜佑《通典·边防典》引录的片段

中不难看出,《经行记》关于伊斯兰教的介绍相当具体和准确,这是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国人首次经过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后所作的较为客观正确的记载。

宋、元时期,由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政治格局的剧变、军事活动的频繁以及商业交往的活跃,中外人员大量流动,大批阿拉伯和波斯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士兵、工匠、商人等,或随军,或贸易,纷纷来华,并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积久成群,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进而逐渐“华化”,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及长安、北京等大都市建立起清真寺和公共墓地,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来说已不是一种陌生的域外文化。特别是元代,穆斯林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故《明史》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和多方面的交流,汉唐以来开辟的海陆“丝绸之路”持续繁荣,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先进技术借阿拉伯而西传,远至欧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大范围东渐,伊斯兰教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和独特人文科学传入中国,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元代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就多达二百多部。

明清时期,回族穆斯林学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和起色,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陕西胡登洲(1522~1579)先师开创“经堂教育”模式,从此改变了伊斯兰文化研习领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明之无自”^{[1]518}的局面。经堂教育的开展,使被称为“天方之学”的伊斯兰文化的研习活动在我国得以长期延续,内容涉及宗教、哲学、语言(阿语、波斯语)、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培养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精通阿语、波斯语并对伊斯兰文化颇有造诣的著名经师,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是这种研习活动往往局限于清真寺内,且大多以口授的方式进行,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字成果,但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一种独特学术传统,这种“寺里的学术”延续至今,其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另一值得称道的“以儒诠经”暨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活动的开展。以王岱舆、马注、刘智及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一批“回儒”,学贯中外,博通四教(伊、儒、释、道),致力于“用儒文传西学”,著书立说,“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遵中国之礼,引孔孟文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他们借用大量儒、释、道(特别是儒)的术语,以典雅的汉语阐发伊斯兰教义,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为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在思想理论方面卓有建树,“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2]424}

王岱舆(约1584~1670)向来被推为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家之首,“因为他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中第一位系统地论述伊斯兰教哲理并负之刊行的人。”^{[3]4}他的代表性著作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及《希真正答》等。约略与他同时的另一位著述家张中(约1584~1670),著有《归真总义》(《伊玛尼解》),译有《四篇要道》。王岱舆的弟子伍遵契(约1598~1698)也是当时很有成绩的译述家,译有《归真要道》,是波斯语经典《米尔萨德》的汉译本,自述“译义求达,不敢藻饰”。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是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的首倡者,为中国的“天方之学”凿山铺路,是开回族穆斯林学术新风的先贤。

马注(1640~1711)是早期云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清真指南》历十年而成,“十万余言,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4]3},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鸿篇巨制。与马注大体同时的还有马忠信、米万济、马明龙、马伯良、袁汝琦等人,也都是经汉兼通的穆斯林学者。

刘智(约1655~1745)是自王岱舆以来最负盛名的学者,著述颇丰。其中《天方性礼》、《天

方典礼》及《天方至圣实录》三部最具代表性，“这三书，真可以当得‘体大思精’四个字。”^{[5]420}刘智将伊斯兰教哲学与宋明理学融会贯通，构建了“天方性礼图说”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体系，是“以儒诠经”活动的集大成者。与刘智同时的还有金天柱（1736~1795）等人，天柱曾供职于翰林院四译馆多年，著有《清真释疑》等，提出“回汉两教，原相表里，不可诬也”，因为“天方之教以奉主命、朝拜为务。自隋唐传入中幅，一切明心见性之旨，足与吾儒相表里。”^{[6]2}其宗旨依然在于沟通回汉文化、消除相互误解。

马德新（1794~1874）是明清之际最后一位杰出的回族伊斯兰教译著家，译著极丰，颇有建树。代表著作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真诠要言》、《指南要言》、《天方性礼注释》、《寰宇述要》、《天方历源》、《宝命真经直解》（《古兰经》前5卷汉译）及《朝觐途记》等。马德新“一方面沿着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前辈穆斯林学者的学术轨迹，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条予以符合儒家价值取向的阐释，以满足中国穆斯林尤其穆斯林知识分子的需求，消除汉回之间、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隔阂，为伊斯兰教、回族的生存和近代化发展谋求合适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马德新坚持伊斯兰教的特色思想，以真一论、大化论、幽明与复生说、圣人说、明德说等思想补儒家文化所不足，从理论及社会教化两方面阐述伊斯兰教的积极意义。”^{[7]1-2}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也是一位有造诣的译著家，他的突出成绩是对马德新著作的整理和修润，马德新所译《天方诗经》就是经他整理、补译而成的。

兴起于明末、几乎延续清代“以儒诠经”及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充分吸纳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着力构建“回儒一体”的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行比较研究，开展文明对话，以期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先生语），和而不同的境界。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种文明对话的努力和尝试并未引起主流学术界的重视。然而，“以儒诠经”活动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则是毋庸置疑的。

“以儒诠经”活动也有不足和缺陷，尽管王岱舆、刘智以及其他明清时期的回儒学通四教，但毕竟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他们所能搜罗到的关于伊斯兰文化的最新资讯有限，难以了解伊斯兰世界学术发展的动态和全貌，也难以对伊斯兰文化诸学科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对于这些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事实上，在译介和研究伊斯兰文化、透彻理解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并将两大文化的融会贯通等方面，至今还很少有人能与王岱舆、刘智、马德新等明清回族大儒相匹敌。

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中国学术界吹起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王皓然（1848~1919）阿訇首倡革新传统经堂教育，新式伊斯兰学校以及各种介绍伊斯兰文化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创办，王静斋（1879~1949）、达浦生（1874~1965）、马松亭（1895~1992）、庞士谦（1902~1958）等知名阿訇频繁深入伊斯兰世界腹地作实地考察，更有马坚（1906~1978）、纳忠（1910~）等一批青年学子远赴埃及求学，了解伊斯兰世界文化发展之大势，并及时向国人予以介绍。这些努力均使这一时期我国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者，诸如杨仲明（1870~1952）、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1888~1943）、马松亭、庞士谦、马坚、纳忠及白寿彝（1909~2000）等，他们的大量学术活动拓宽了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领域，提升了研究的层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不仅继承了王岱舆、刘智以来的优良学术传统，而且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更为赤热的爱国精神，洋溢着浓郁的国民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体现出复兴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强烈

使命感和责任感。

王静斋(1879~1949)阿訇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学大师,毕生爱国爱教,执著于伊斯兰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积极倡导革新经堂教育,培育中、阿兼通的新型人才。1936年他在北京组织回教典籍编译社,致力于伊斯兰教典籍文献的翻译和出版。1938年在河南与同道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亡。王阿訇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述丰富,主要译著有《回耶辨证》、《中亚字典》、《中阿双解新字典》、《选译详解伟嘎业》、《真境花园》及《古兰经译解》等。

马坚教授(1906~1978)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回族穆斯林译著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孜孜不倦,成就卓著,代表著述有《(阿译)论语》、《古兰经》、《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哲学史》、《教义学大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回教教育史》、《穆罕默德的宝剑》、《回历纲要》、《阿拉伯通史》及《阿语汉语词典》等。“马坚教授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教典的传统;又一方面,是学习汉文化的传统。这两个方面,恰好在马坚教授身上都有所体现。”^{[5]508}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回族穆斯林学者所开拓的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事业,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汉族学者的关注,有的汉族学者甚至亲自参与到有关领域的研究当中,而且颇有建树,如汉族学者铁铮由日文转译的《可兰经》于1927年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首开我国《古兰经》汉语通译之先河;陈汉章(1874~?)、陈垣先生(1880~1971)则开拓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新领域;顾颉刚先生(1893~1980)曾在《大公报》(1937年3月7日)发《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予以特别关注,提出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回教史课程、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议(第七卷第四期),并在他和谭其骧先生(1911~1992)主办的《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文章,先后推出《回教与回族专号》及《回教专号》两期专刊,推动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汉族学者的加盟,对于提升和拓展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层次和范围,并使之进入中国的主流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回族学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除了马坚、白寿彝、纳忠等学界前辈继续开拓创新,并有出色成绩之外,更有不少学术新人不断涌现,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及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绩,学者众多,著述颇丰。至此,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开拓并传承的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已不再是一种不为“教外学者”所知的民间学术,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古老的“天方之学”开始跨入汉回各族学者携手合作、共建我国“伊斯兰学”、“阿拉伯学”的新时代。^{[6]1-10}

二、“天方之学”的学术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天方之学”的学术历程中,始终彰显出如下学术精神:

1、重视对外语的研习,特别是对作为伊斯兰文化语言载体的阿语的研习

要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熟悉有关外语特别是阿语至关重要。阿语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最重要的语言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得阿语,就难以真正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阿语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到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理解的准确度及研究的深广度。

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但凡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方面都颇有造诣的中国穆斯林学者,无一不精通阿语,有的学者甚至还精通波斯语、乌尔都语、英语等多种外语。他们为学习阿语等耗费了大量精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对外语特别是阿语的熟练掌握,又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成为他们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保证。可见,重视对阿语乃至波斯语的研习,是回族穆斯林进行伊斯兰文化研究中所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

2、重视对伊斯兰文化原典的研读,尤其重视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研习

翻阅自王岱舆以来历代回族穆斯林学人的著述无不让人真切感受到他们对伊斯兰文化原典的熟知,尤其是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熟悉,但凡引经据典,莫不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在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人的著述中,“经云”、“圣曰”这样的引证俯拾即是。如经云:“莫非尔等猜度真主,造化尔等特为游戏而已,果不复归于真主之尊阙乎?”(王岱舆《正教真诠·后世》);^{[9]139}经云:“尔等拜主,尔等孝亲。”(王岱舆《正教真诠·至孝》);^{[9]91}圣云:“正教之男妇,习学乃明命也。”(王岱舆《正教真诠·正学》);^{[9]75}圣云:“尔等皆若牧羊之人,将来自尔等之职掌一一皆有问焉。”(王岱舆《正教真诠·首领》)。^{[9]96}真主喻云:“随其所处,真主同于尔等也。”^{[10]64}真主喻云:“他们是聋的、哑的、瞎的,所以他们不解。”(马注:《清真指南·本用》)^{[10]64}故经云:“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马注:《清真指南·天命》)^{[10]69}等;王静斋先生为《古兰经》的汉语译介倾注巨大心力,几易其稿;马坚先生更将译介《古兰经》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且为之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由此足见,历代回族穆斯林学者深得伊斯兰研究之要,花大力气研读《古兰经》和圣训,因为他们清楚,《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原典,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诸学科不断发展的思想源泉,不了解《古兰经》和圣训,就无法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真精神。

3、重视对汉语及国学的研习,尤其重视对儒家学说的研习

在历代回族穆斯林学者开展的伊斯兰文化研习活动中,除了重视对阿语及伊斯兰文化原典的研读外,还重视对汉语及中华文化原典的研习,尤其重视对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造诣深厚的回族穆斯林学者,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无一不是“经汉兼通”的学者。他们知道,作为中国穆斯林学者,没有扎实的汉语功底,没有良好的国学素养,不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就难以完成向中国人正确介绍伊斯兰文化的艰巨任务。阅读先贤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仅对汉语的运用自如畅丽,典雅优美,而且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深得其味,对儒家、道家、佛家哲学和宗教思想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尤其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引证用典,莫不言之有据,准确精通。如刘智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就相当透彻,绝不亚于同时代的汉族学者。马坚先生更具深厚的国学造诣,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评价的:“马坚教授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有相当的深度。他所译各书,都俨然大家风范。”^{[5]510}

4、重视沟通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促进两大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和融合

从王岱舆到马坚以来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担当了沟通中阿文化、促进中阿文化相互交流的重任,为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在向国人介绍伊斯兰文化方面,还是在向伊斯兰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方面,他们都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如马德新和马安礼翻译的《天方诗经》,于1848年在成都刻板成书,比《巴黎茶花女遗事》早8年问世,“开创了我国阿拉伯文学翻译的先河,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1]59-60}。马坚先生早在30年代留学埃及期间,就将《论语》译为阿语,又倾其毕生精力从事《古兰经》的汉译工作,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我们的学者依然面临着繁重的进一步沟通中阿文化的任务,因为无论是阿拉伯—伊斯

兰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还是中国人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从深广度上看，还都十分有限，需要“拿来”和“送去”的东西还有许多。

5、重视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结合中国实际，致力于开展教法创制和文化创新

“创制”（al-Ijtihad，伊智提哈德）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历史传统，是伊斯兰教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也就是文化创新工作。无论是先贤胡登洲创设经堂教育、王岱舆著书立说，还是马坚教授译经著文，无论是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活动，还是20世纪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都是中国穆斯林学者秉承伊斯兰文明倡导创制的传统而开展的文化创新活动，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史上的壮举，建树不凡，意义深远。按照伊斯兰文化的术语来说，所有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艰苦的“创制”工作，旨在使伊斯兰文化适应中国的新环境，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坚先生曾对这种与时俱进的创制工作有过形象地解释：1926年马坚先生担任家乡鱼峰小学校务主任，他在推进教学改革时指出：人要随季节的变化而增减衣服，否则就要伤风感冒，甚至患大病，“随机应变”是真主给予我们的“恩赐”，更是真主的伟大。^{[12]59-60}

纵观回族穆斯林的学术传统，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穆斯林的历代贤哲，正是遵循伊斯兰文化的“创制”这一“运动”原理，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取，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开展艰苦的创制工作，致力于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回族穆斯林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创新。而且，这些活动的意义还不局限于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建设和创新方面，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视阈看，乃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丰富、发展和创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中外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面，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穆斯林贤哲们的学术活动都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6、寓爱教于爱国，使爱国爱教相互统一，融为一体

回族穆斯林的先民固然是来华的外帮人，但回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却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回族人中国人”的观念是这个民族自诞生之时起就具有的强烈意识，因此，爱国主义是回族人民与生俱来的民族品质。同时，回族人又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这个传统观念的核心就是伊斯兰教，因此，爱教也是回族穆斯林的民族品质。然而要恰当地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开展艰苦的创制工作从理论上予以解决。先贤王岱舆明确提出了“真忠正道”的政治观，认为“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因其源清，而无不清矣。”^{[9]88}（《正教真诠·真忠》），“忠君”的实质就是爱国，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问题。“王岱舆的‘真忠正道’政治观，是回族在历史上始终和祖国保持一致的思想认识基础，是自元以来数百年间回汉两族人民紧密团结，互相依存的民族关系反映在理论上的积淀和升华。……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斯兰教自植根中国后，先在实践中解决了‘二元忠诚’问题，但在理论上的解决，却自王岱舆始。毋庸置疑，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对维护祖国统一，确定回族在统一国家中的地位，搞好民族团结，都是有深远意义的。”^{[2]398-399}自王岱舆以后，历代回族穆斯林学者都秉承爱国爱教的传统，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不断深化和提升这一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穆斯林长期承传的优良传统。^{[13]P21-24}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忠君”不再是爱国的表现。在20世纪初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中，许多学者积极投入唤醒穆斯林国民意识的文化活动中，回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空前觉醒，爱国激情空前高涨，在中华民族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追求民族解放的历次革命运动中，穆斯林学者与广大穆斯林同胞一起，恪守“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训导，与全国各族人民并肩携手，浴血奋战，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凯歌。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王静斋、时子周（1879~1969）阿訇在郑州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唤醒民众，号召抗战；宁夏著名阿訇虎嵩山（1880~1955）写出阿语、汉语对照的祈祷词，谴责日本侵略，祈祷抗

战胜利；70 高龄的马良骏（1867~1957）大阿訇在新疆提出要参加抗战，并广泛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又积极致力于新疆的和平解放。云南纳明安教长坚持每天晨礼后率众诵经祈祷，默祝中国战胜日本，长达 8 年之久，直至抗战胜利；成达师范校长马松亭等许多知名穆斯林学人更是奔走各方，远赴海外，大力宣传抗日；上海伊斯兰师范校长达浦生曾借钱自费出国宣传抗战事迹，为国难募捐，事迹尤为感人。留学海外的马坚等穆斯林学子，日夜心系国难当头的祖国，发表文章、演说，印发传单，甚至节衣缩食，募捐资金，为抗战的正义事业竭尽全力。

纵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爱国主义精神在回族穆斯林的学术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只是在不同时代所体现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概言之，回族穆斯林学术活动中的爱国主义是一以贯之、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它生动地说明，中国回族穆斯林开展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活动，并不只限于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更着眼于报效祖国、共建中华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崇高目标。

三、结语

如前所述，“天方之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艰难而曲折，也是富有创新意义的，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实践活动。因此，它既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一种对话交流方式，同时也是伊斯兰文化实现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过程。当我们重读先贤的著作，了解我国“天方之学”的艰难学术历程和可贵学术传统时，应当思考怎样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在今天的伊斯兰研究、阿拉伯学研究中，依然需要重视对外语的学习，特别是阿语的学习；依然需要认真地、正确地解读伊斯兰文化的原典；依然需要熟知中国传统文化；而今天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也更加需要坚持和发扬与时俱进、爱国爱教的精神，把握和了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努力开展文化创新。当代学人，特别是致力于当代中国“阿拉伯学”建设的学人，理当很好地继承我国“天方之学”的学术遗产，发扬先贤们优良的学术传统，使今天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并研究这个传统，对此传统作出清晰的梳理和全面的总结，本文便是基于这一认识的抛砖之作。

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创的“天方之学”，的确是值得我们作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的课题，正如白寿彝先生曾指出的：“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跟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跟中外穆斯林弟兄间的友好往来有密切关系的问题。”^{[5]204}在中阿建交 50 周年之际的今天，梳理和研究我国“天方之学”的学术传统，对于促进今天乃至未来的中阿文化交流、构建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 [1]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上）[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 [2] 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 [3] 余振贵. 点校题记[M]. //王岱舆. 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 余振贵, 校.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 [4] 郭璟,等.清真指南校注序言[M]//马注. 清真指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 [5]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6] 金天柱.清真释疑（海正忠点校）[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2.

- [7] 余振贵.马德新思想研究序一 [M]. //杨桂萍.马德新思想研究.海正忠,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 [8] 朱威烈.汉回学者和谐合作共建我国阿拉伯学——中国阿语教育史纲代序[M]. //丁俊.中国阿语教育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9] 王岱舆.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 [M]. 余振贵,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 [10] 马注.清真指南 [M]. 郭璟,等,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 [11] 朱威烈.站在远东看中东[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2] 林灿良.学者丰碑——纪念马坚先生诞辰 100 周年[EB/OL].[2006-05-23].
<http://www.gulanjing.com/jigouxz/majian100.htm>.
- [13] 丁俊.中国穆斯林阿语研习活动中的爱国主义传统[J]. 新月华. 2005(1).

The Academic Course and Spiri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a —from Wang Daiyu to Ma Jian

DING Jun

Abstract Arab-Islamic culture stud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tradition of Chinese Muslims. During several centuries, from the sage Wang Daiyu (about 1584~1670) to Prof. Ma Jian (1906~1978),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Chinese Muslim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slamic thought system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erchange between Islamic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They not only have been working hard in Islamic studies circle, but also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and got som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ircle. Without doubt, to sum up and carry on this great academic tradition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our Arab-Islamic studies and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today.

Key Words Islamic Studies; Arab-Islamic Studies; Academic Spirit; Wang Daiyu; Ma Jian

(责任编辑: 杨 阳)